

· 理论与史 ·

# 时空跃迁：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时代启示\*

李英华\*\*<sup>1</sup> 钟年<sup>2</sup>

(<sup>1</sup>太原学院教育系, 太原, 030032) (<sup>2</sup>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 稻米理论主张的“南方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难以呼应我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文化价值观是自我建构的心理基础, 对集体主义文化下自我建构的特征及其社交表达进行梳理后认为, 稻米理论对集体主义文化之构念同本土实际情况存在差异, 且对巨大社会变迁中的自我建构探查不够充分, 造成了其现实面向之矛盾。“时空跃迁”为解释南北方文化价值观差异提供了新视角, 南方在集体主义文化基础上, 因其改革开放之前沿位置而快速融入了比北方更多的个体主义文化。时空跃迁推动了集体主义文化吸纳个体主义文化优秀因子的进程, 促成了“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优化的自我建构”, 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动力与自我建构方面的生动实践。

**关键词** 稻米理论 时空跃迁 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 优化的自我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

## 1 引言：南方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吗

稻米理论 (rice theory) 以农作物的耕作类型切入, 阐释了中国南北方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文化分野, 认为南方集体主义文化倾向较北方更为强烈 (Talhelm et al., 2014), 并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指出, 南方人更多使用相对谨慎、具有防范倾向的词汇 (Guntuku et al., 2024), 且水稻种植需要严格的社会规范来应对高劳动力需求, 故而南方创新思维水平较低 (Talhelm & English, 2020)。这些观点与“文化差异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关系”的普遍性认知存在较大反差, 难以呼应中国南北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个体主义文化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Friedman, 2002; Smith, 2011), 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济学观点。Inkeles (1983) 指出, 个体现代性是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每一个理性人表现出的自利性行为动机, 最终成就了市场“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它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 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Smith, 2011), 在不损害他人自由的前提下, 个体充分运用自身能力与机会, 可逐步达成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Friedman, 2002)。经济发展亦可提升个体主义文化 (Greenfield, 2016; Inglehart & Baker, 2000; Santos et al., 2017), 而且国家 (地区) 越富有, 个体主义文化程度越高 (Hofstede et al., 2010)。至于集体主义文化, 却往往会抑制经济发展 (罗必良, 耿鹏鹏, 2022; Olson, 1980), 因为理性个体始终以自我利益为上, 不会为了集体的共同利益而主动采取行动 (Olson, 1980)。

个体主义文化促进经济发展, 抑或经济发展提升个体主义文化, 二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走向本质上不会对其存在相关的事实造成干扰。结合稻米理论的观点推断, 个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北方应当在市场运行、经济增长方面均胜于集体主义文化较强的南方, 然而现实却恰恰相反: 中国经济“南强北弱”“南快北慢”的差距一直存在并且还在不断扩大 (Wang et al., 2023)。诚然, 这一结果的发生并非耕种方式所致, 也不在稻米理论的解释范畴之内, 而是包括历史原因在内的诸多因素使然, 但并不妨碍我们认识到这一现实状况与稻米理论之间的明显反差——“南方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之观点难以呼应我国南北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有悖理论与实践互生

本研究得到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项目 (2025B77)、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2021YJ092)、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课题 (SXSKWC2023071) 和太原学院科研项目 (24TYB12) 的资助。

\*\* 通讯作者: 李英华, E-mail: liyinghua@ty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60221

共进的应然要义，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对此投以关注。除稻米理论外，一些较有影响力的理论也解释了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地域差异的成因，例如传染病理论（pathogen prevalence theory）、气候-经济理论（climate-economic theory）以及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其中，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更早、解释力更强（徐江等,2016），与“经济发展提升个体主义文化”之观点具有一定共通性，即与稻米理论存在一定矛盾，但也有研究表明，中国香港、日本的经济水平较高，却具有集体主义倾向（Hamamura, 2012），这又与稻米理论具有一致性。尽管存在矛盾，但作为同一主题下的各具解释力的理论，本无优劣之分，本文也并非意在理论间的比较，而是试图以稻米理论为切入口，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寻找文化动力方面的恰当解释。同时，也希望能为文化心理的本土探索做出一点有益尝试。

如何破解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中存在的矛盾？又该如何确证中国南北方的文化价值观倾向？已有文献曾从样本选取、模型设计（Hu & Yuan, 2015；Ruan et al., 2015）、变量控制（Roberts, 2015）、测量方法（朱滢, 2014；朱滢, 2015）以及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契合度（汪凤炎, 2018；汪凤炎, 2019）等多个视角对稻米理论提出质疑，本文认为，稻米理论本质上是在探讨不同文化动力下的自我建构差异，对集体主义文化构念的辨析或可作为破解该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切入点。一种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的一贯模式（Benedict, 2005），文化是人格的典章式放大，人格则是文化的代表性缩微。人格与文化的一致性使二者可互为考察视角，而自我是人格的一种基础性体现——“自我集文化与个体于一体，是反映文化与个体相互影响的重要指标”（杨中芳, 2009）。自我建构不仅是以文化价值观为基础完成的心理过程，也是体现我国“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取向的重要观测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将按照如下思路展开讨论：首先对集体主义文化下自我建构的特征及其社交表达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探查稻米理论缘何难以呼应南北方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之后，立足时空尺度，逐步具象地梳理南北方文化价值观变迁，并尝试提出解释当今南北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新视角。

## 2 以自我建构为视角探查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

### 2.1 关系：互依型自我建构的核心要素

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独立我）与互依型自我建构（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互依我）常用于解释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下的自我建构特征。独立我是一个完整的、可以不依赖于他人存在的单元，互依我则将自我看作某种“碎片”，需以某种形式加入群体之中方为完整，加入并适应某一群体是个体获得自尊的必由之路（Markus & Kitayama, 1991）。换言之，“个体本身及其所处的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网络”都在互依我的边界之内，并且这一边界是相对模糊的、流变的、具有张力与包容性的（Ho, 1985；Sampson, 1988）。文化是自我建构的底色，决定了自我建构的基本特征。独立我与互依我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在自我意识上的体现，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个体是否在关系之中”。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下建构起来的自我，主要以互依我的方式存在。

“关系”是构成互依我的核心要素，往往决定着个体的行为（何友晖等, 2007），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公与私”灵活可变，没有明确的固定的界限。“‘个己’与‘群体’及‘社会’的关系变为是几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的关系”（杨中芳, 2009），组成了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2015）。站在任何一个“同心圆”向内看，都可谓之“私”；向外看，皆可谓之“公”，但无论怎样，都构成了当时情境中的“自我”。“随着私我内容的变化，公我内容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反之亦然”（汪凤炎, 郑红, 2015）。“公私自如”意味着自我的半径是极具弹性的，这种弹性与“混合性关系”关联紧密，并以“脸面意识”的方式体现在社交实践中。

### 2.2 混合性关系：互依型自我建构的社交敏感区

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是黄光国（2006a）对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大致分类。情感性关系能够满足个体在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工具性关系基本无关情感，可视作个体为了获得自己所希冀的某些物质目标的手段；混合性关系则介于两者之间，即交往双方彼此认识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情感性关系，但又没有深厚到可以随意表露出真诚的、不加任何整饰的行为。三种关

系的亲密程度与脸面意识成“倒U型”（李英华，2023）。具体而言，不同于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与交往对象的“亲密”和“疏离”，混合性关系遵循人情法则，关涉较强的脸面意识，表现为交往双方既非绝对亲近以致不必顾忌脸面，又非完全陌生无需考量脸面。

混合性关系构成了互依我的社交敏感区。通常在这种关系中，“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黄光国，2006a），也因此催生了普遍存在的脸面心理<sup>①</sup>。一个人处理社交事件之“得体”往往意味着交往双方都要感到“有面子”、至少不会认为“没面子”，万万不可落到“丢面子”的境地，这成为评价一个人社交能力的普适性标准。虽然“人情与面子”作为关联度极高的社交元素组合，已然成为中国社会中的冲突化解模式（黄光国，2006b），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也可能异变为规则与秩序的羁绊。身处混合性关系时，交往双方往往更敏感于脸面的增益与减损，更可能因此囿于“人情与面子”，进而影响市场契约的良性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罗必良，耿鹏鹏，2022；Ritchie & Gill, 2007；Whyte, 1996），这一结论部分呼应了“文化差异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关系”的普遍性理解，也间接说明了混合性关系是稻米理论之盲区所在。

进一步而言，马欣然等人（2016）在认同稻米理论的基础上发现，南方人对朋友与陌生人之间的心理界限较北方人更为明显，即南方人情感性关系（朋友）与工具性关系（陌生人）之间的界限更为分明，混合性关系存在的空间较小，换言之，在对人际关系类型细分之后，南方人混合性关系发生的可能性较低，意味着倾向集体主义的南方人反而不甚在意脸面心理，表明稻米理论在观照集体主义文化内涵时是难以自洽的。此外，虽然稻米理论以基于统计数据的“离婚率与专利比”的分析来控制代际差异（Talhelm et al., 2014），但由混合性关系引发的自我建构层面的矛盾无疑也是解释该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反差的关键所在。

### 2.3 稻米理论缘何难以呼应南北方经济发展现实状况

本文认为，“南方人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之所以存在现实面向之矛盾，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对集体主义文化的构念同中国本土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基于多人共同劳作而发生的合作”（Talhelm et al., 2014）的确是集体主义文化意蕴的一部分，但从自我建构视角来看，互依我所蕴含的“关系”也是其要义所在。“重视事物的功能联系超过重视实体形质；重视综合超过重视分析，已然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张岱年，成中英，1991）。“协作”与“关系”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一体两面，只有一面不能将其简单解释为集体主义文化。虽然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形成过程是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创新水平及市场活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混合性关系引发的“关系羁绊”进而影响到市场契约的健康发展，或许是诸多影响因素中隐性却具有一定效力的因素之一。稻米理论未充分考查“关系”，仅凭“协作”判定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还是存有一定探讨空间的。

第二，对巨大且快速变化中的自我建构因素探查不够充分。稻米理论形成于本世纪初，彼时，中华大地上的历史性变革已卓具成效，东西方文化导致的差异逐渐模糊化，西方现代人格中蕴含的独立、多元等一部分适合我国本土的个体主义文化因子正有机融入集体主义文化之中。就稻米理论而言，一方面，从年龄上看，该理论中的被试正是彰显独立、体现现代人格且更倾向个体主义的群体<sup>②</sup>，与其“倾向集体主义”之结论相矛盾；另一方面，从空间上看，如果将基于儒家思想诞生并发扬的集体主义文化看作是中华大地的原创、个体主义文化是舶来品的话，那么，南方因其改革开放的前沿位置是最先接触个体主义文化、最先感受到“现代化”的地域，南方人在现代人格上也因此表现得更为明显，即更倾向个体主义，这也与其观点相矛盾。稻米理论在探讨南北方文化差异时忽略了时代变革对自我建构的影响，也是有待商榷的。

综上，对中国文化动力之传统（集体主义文化的构念）与现代（社会变迁中的自我建构）的失察，而仅凭对实验与统计数据做出的静态分析，是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主要成因。南北方个体

<sup>①</sup>考虑到“脸”与“面”在社交表达中各有其功能，故而以“脸面心理”而非“面子心理”表述。

<sup>②</sup>稻米理论的被试是来自北京、福建、广东、云南、四川和辽宁的1165名汉族大学生，文中未见其明确年龄信息，按照文中相关语句（most of our participants were born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which started in 1978）及其发表时间（2014年5月）来推断，这些被试更可能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

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的差异不仅受农耕方式影响，还受到社会变迁、移民流动、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稻米理论单一视角的解释因此存在局限。进一步而言，集体主义文化是儒家思想的硕果（其雏形可能是远古先民治水时的“通盘考虑”以及强调平衡与辩证的“阴阳五行说”；汪凤炎，2018），即中华大地的“原生品”，个体主义文化则是“舶来品”，简单将其看作是耕种方式所致的本土产物，是缺乏大历史观支撑的。诚然，稻米理论所代表的文化心理的生态理论较为宏观，空间上，对“水稻-小麦”耕种方式的比较并非局限于中国（Talhelm & English, 2020）；时间上，利用中国历史上的时代背景，指出文化价值观差异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形成（Talhelm & Dong, 2024），并且只是在程度上论证了中国南北方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别，并非否认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底色，然而，其“（中国南方）水稻种植区更倾向集体主义文化”之核心观点在“文化动力对于中国人心理塑造”方面的解释效力显然比其提出者认为的要弱很多（Ruan et al., 2015）。

### 3 时空跃迁：探查当下南北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新视角

#### 3.1 时空尺度下的文化价值观变迁

时空尺度下的文化价值观变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集体主义文化源于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又发轫于北方大地，因此，北方具有相对厚重的集体主义文化根基，然而，历史上不仅有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和中原汉族南迁，也有近现代国民革命军北伐、红军北上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大举南下，更有改革开放之后“下海热”引发的移民潮。纵贯中华历史的南北方移民史早已在广阔的时空内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南北方集体主义文化的“孰轻孰重”，更何况农作物种植史、经济与气候方面的差异，甚至政策层面的20世纪中叶农村集体经济的合作化浪潮（费孝通，2002），都在影响当地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也自然会对其自我建构产生影响。因而，对中国南北方文化价值观的二维划分本就是一项错综复杂的工程。

当这种宏观上的变化经由时间沉淀并反映在个体身上时，文化价值观也得以较为具象地表达。受限于心理学的本土化发展历程，目前鲜见较长时间跨度的南北方文化差异研究，或许秉承“长期扎根

田野”理念的人类学更能“表达”出“时空”对个体文化价值观的塑造。一些关涉南北不同地域的经典研究展现了当地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变化：费孝通（2002）于1936年暑期考察江苏开弦弓村（江村）后，着重分析了农村集体经济促发的个体间合作互助的现象；庄孔韶（2016）则延续了其导师林耀华对福建金翼村（黄村）的研究，通过1986~1989年间对该村长长达十四个月的调研，探查了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在传统/现代文化、东方/西方文化的交互冲击下发生的变化；Yan（2009）基于其1971~2008年间在黑龙江下岬村的生活经历与田野调查资料，以当地居民的生活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式的个体主义”是如何在社会变革中得以孕育并逐步浮现的。人类学家展现的不同地域的农村居民心理发展图景，形成了偏空间尺度的、探查文化价值观变迁的“透镜效应”，但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借助这些研究完成的关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之南北差异”的理解显然还不甚鲜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南方经济之飞速发展向世界展现了“个体化的中国模式”（Yan, 2009），也逐渐拉开了与北方的差距。首先，南北方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南强北弱”“南快北慢”的格局。国家统计局网站2024年数据显示，GDP排名前10的省份中，有8个均在南方，其中，广东以14万亿元GDP连续36年蝉联全国第一，GDP排名前10的城市中，除北京外，其余均在南方，其中，上海成为全国首个5万亿GDP城市。我国五大经济特区均在南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发展势头强劲；其次，南方创新水平胜于北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数据，仅2024年参与全国专利省域调查的8个试点省份中，企业发明专利通过研发获取的比例高于全国总体水平的有4个省份（上海、广东、辽宁、福建），南方占有3席，并非Talhelm等人（2020）认为的南方创新思维不足以致发明专利率较低。此外，在文化价值观上，南北方也存在明显差异。研究表明，南方会鼓励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侯东霞等，2016），因而南方人的个体主义水平整体上高于北方人（任孝鹏等，2017），现代化程度更高，开放性也越强（周明洁，张建新，2007），这显然与Guntuku等人（2024）主张的“南方人相对谨慎、具有防范倾向”之观点相去甚远。以深圳这座极具代表性的新兴移民城市为例，其城市精神中的“敢闯敢试、开放包容”抚育了独立自我的行为方式，个体主义水平更高（陈

欣欣等, 2019), 展现了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积极意蕴, 也间接表明年轻化程度高的城市居民更易接受个体主义文化。南方鲜明的社会发展进程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经济发展与个体主义文化的内在联系, 为区分中国南北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地域差异提供了有力的参照。至此, 空间尺度下的南北文化价值观差异得以进一步清晰。

### 3.2 时空跃迁之理论定位与价值阐释

以上, 本文以时间线索为序, 讨论了中国南北方文化价值观的变迁, 认为当今之中国, 整体为集体主义文化的背景下, 南北方分别倾向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相较北方人而言, 南方人自我建构中的独立成分比例更高(任孝鹏等, 2017), 更少在意“关系(尤数混合性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脸面增益与减损, 经济发展也就更少受到人情与面子的羁绊, 某种程度上, 这一现实差异正是社会高速发展的结果。由此, 本文尝试提出解释当今中国南北方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差异形成之假说——“时空跃迁”(time-space transition)。“时空跃迁”特指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价值观的跃迁式发展(不包括更长时间内的历史变动, 例如移民潮、政策变革), 时代性与适应性是其理论意涵的重要特征。时代性是指对当下中国社会心理的解读, 反映的是身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文化价值观; 适应性则意味着文化价值观的变革具有历史主动性, 是中国人民主动选择、积极适应的结果。质言之, 是社会的飞速发展促成了文化价值观跃迁式的发展, 这种发生在价值观与社会心理领域的变革, 也被称为“中国体验”(周晓虹, 2017)。

同样关涉文化价值观的变迁, 但时空跃迁与现代化理论存在本质区别。现代化理论是一个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体系, 其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认为, 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向欧美型发达国家系统性演变的过程, 其核心是价值观的转变(Parsons, 1971)。按照这一观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必然以西方为模板, 需要完成文化价值观从集体主义文化向个体主义文化的转变, 意味着中国人文化基因的西方化。然而, 事实上, 集体主义文化在中华大地绵延几千年, 深受其影响的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是稳定且不易改变的(傅根跃, 李康, 2024)。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的宏阔图景, “时空跃迁”正是中国道路独特性的现实表达, 文化价值观跃迁式的发展意指南方在原有的集体主义文化基础上,

因其改革开放之前沿位置而快速融入了比北方更多的个体主义文化, 并非其文化价值观的内核性改变。这一点与现代化理论具有根本性的区别。此外, “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 Harvey, 1989)与“时空跃迁”同样是表达社会发展之快带来的变化, 但前者用以说明生活节奏加快带来的时空压缩之感, 而后者则指向历史状态的大幅度、跨越式的提升, 应和了加速演进的时代之变。

### 3.3 时空跃迁视角下的文化动力与自我建构

进一步而言, 时空跃迁视角下的集体主义文化应指向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构念, 本文将将其称为“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构念, 不仅包含中华民族原有的集体主义文化优秀因子, 还包含在社会变迁中有机吸纳的一部分适用于本土的其他文化(主要指个体主义文化)的因子, 兼具深厚根基与崭新活力, 这也是其“发展性”之要义所在。本文引证经济学领域“集体主义文化往往会抑制经济发展”之观点中的“集体主义文化”, 即传统的、羁绊于人情与面子的集体主义文化, 而“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集体主义困境”(Olson, 1980), 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文化动力, 具体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合作与竞争并存, 强调的是政府主导下的良性竞争, 追求活力与秩序的有机统一, 而非Liu等人(2019)认为的“中国人倾向将内群体成员的友好解释为伪善, 为了核心利益不惜采取不道德行为”的恶性竞争。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它必定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文化, 也有别于阻滞经济发展的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 是文化动力守正创新的结果。这一构念的丰富与时空跃迁有着莫大关联, 如若将文化中利于社会进步、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因素视为优秀因子的话, 则意味着时空跃迁推动了集体主义文化吸纳个体主义文化优秀因子的进程, 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动力发展层面的生动实践。

有必要论及“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与文化混合理论(cultural hybridization)、文化混搭理论(culture mixing)的区别, 首先, 文化混合理论认为, 全球化背景下,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杂糅, 最终会引发新的文化形态, 且西方文化是中国青年效仿的模板(Ashraf, 2017)。虽然时空跃迁假说在文化发展的动态与方向上, 基本与文化混合理论相呼应, 即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文化在彼此交融中发展,

但二者的区别在于“文化主场”是否设立。文化混合理论重在关注不同文化互动的过程，各文化“力量均等”，并未关涉文化主场，而时空跃迁正是以集体主义文化作为文化主场，换言之，对个体主义文化因子的吸纳是具有选择性的，是大历史观下中华民族主动发展的适应性选择。其次，文化混搭理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文化元素在同一时空中呈现，关涉外在环境现象而非个体内部心理体验，多存在于品牌延伸、广告创意等方面（彭璐璐等，2017），这与时空跃迁关涉的“文化价值观”有显著不同。

更宏观来看，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在空间上交融、互促又各有地域侧重，这种渐趋合理的现实状况也是逐步演进而成的，某种程度上呼应了主张“更加连续性”（continuum-based）的文化动力模型（Hofstede, 2010）。或许正是因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包容气质所致的“杂糅”色彩，才使得学者们在研究中国南北方文化动力时，出现了观点相悖的结论，例如，黑龙江地区有很高的集体主义水平（Vliert et al., 2013），也表现出较强的个体主义（白晶莹，任孝鹏，2021；马欣然等，2016）——同一地区且开展研究的时间相近，结论却大相径庭，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现象。

时空变迁不仅推动了集体主义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人自我建构的革新，本文称其为“优化的自我建构”（optimized self-construal）。传统互依我的形成得益于关系，也往往受困于关系——羁绊于人情与面子织就的关系网，致使自我的创造与活力受到一定限制。时空跃迁促使新一代中国人的自我建构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主动进行着调整，“独立我”中尊重多元、彰显个性的成分一定程度上中和了传统“互依我”时常困扰于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因子，既保留了互依我的核心，又兼容了独立我的优势。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价值理念的一种具体表达。“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优化的自我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动力与自我建构方面的具体实践与生动表达。

#### 4 结语

本文基于对稻米理论现实面向之矛盾的破解，提出了以“时空跃迁”来解释当今中国南北方文化价值观差异，呼应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

为探查南北方文化动力提供了新的视角。时空跃迁之理论要义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具言之，对于文化价值观的变化，“跃迁”既反映出时间维度上的“快速”，也表明了变动程度上的“剧烈”，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生动独特的人格实践。时空跃迁不同于现代化理论强调的“现代化之西方模板”，这一实践是基于本土、吸收外来的主动变革，体现出集体主义文化作为文化动力的适应性与包容性。由时空跃迁引发的子概念“发展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优化的自我建构”同样体现了兼收并蓄、守正创新的中国智慧。时空跃迁假说为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积极启示，或可助力中国社会两大奇迹（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心理学解析，以便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经验。

本研究融合了本土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经济学等多个视角，学科视角的多元化对如何在所涉文献观点之间进行流畅对话提出了更高要求，结论稳健性尚需进一步检验。未来要结合心理测量等实证研究的开展，深挖心理学研究的本土资源，尤为关注历时性因素（魏新东，汪凤炎，2022），尝试从社交模式、文化消费乃至不同年龄阶段的民众认知与群体认同等多个角度，探查时空跃迁如何影响当今中国个体主义/集体主义地域差异之形成，进一步系统揭示社会变迁中的“变与不变”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 参考文献

- 白晶莹，任孝鹏. (2021). “闯关东”和独立我的地区文化.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230-250.
- 陈欣欣，任孝鹏，张胸宽. (2019). 深圳精神抚育独立我的行为方式.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14-37.
- 费孝通. (2002).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商务印书馆.
- 费孝通. (2015). *乡土中国*. 人民出版社.
- 傅根跃，李康. (2024). 社会变迁中心理与行为的稳定性：以谦虚效应为例. *心理学报*, 56(7), 994-998.
- 何友晖，彭泗清，赵志裕. (2007). *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侯东霞，任孝鹏，张凤. (2016). 基于客观指标的中国人集体主义量表.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 86-98.
- 黄光国. (2006a). *中国人的心理*. 江苏教育出版社.
- 黄光国. (2006b). *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英华. (2023). “Z世代”青年心理透视：语言亚文化的视角. *新闻与传播评论*, 76(3), 83-91.
- 罗必良，耿鹏鹏. (2022). “稻米理论”：集体主义及其经济解理.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1(4), 1-12.
- 马欣然，任孝鹏，徐江. (2016). 中国人集体主义的南北方差异及其文化动力. *心理科学进展*, 24(10), 1551-1555.
- 彭璐璐，郑晓莹，彭泗清. (2017). 文化混搭：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心理科*

- 学进展, 25(7), 1240-1250.
- 任孝鹏, 向媛媛, 周阳, 朱廷劭. (2017). 基于微博大数据的中国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心理地图.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6(6), 59-64.
- 汪凤炎. (2018). 对水稻理论的质疑: 兼新论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内外因. *心理学报*, 50(5), 572-582.
- 汪凤炎. (2019). 独立自我和互依自我: 从文化历史演化看中式自我的诞生、转型与定格.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 61-77.
- 汪凤炎, 郑红. (2015). *中国文化心理学*. 暨南大学出版社.
- 魏新东, 汪凤炎. (2022).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东西”与“南北”差异. *心理科学*, 45(4), 1017-1023.
- 徐江, 任孝鹏, 苏红. (2016). 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因素: 生态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4(8), 1309-1318.
- 杨中芳. (2009). *如何理解中国人: 文化与个人论文集*.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张岱年, 成中英. (1991). *中国思维偏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明洁, 张建新. (2007). 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城市现代化水平与中国人群人格变化模式. *心理科学进展*, 9(2), 203-210.
- 周晓虹. (2017). *中国体验: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朱滢. (2014). 检验“水稻理论”. *心理科学*, 37(5), 1261-1262.
- 朱滢. (2015). 再谈检验“水稻理论”. *心理研究*, 8(3), 3-4.
- 庄孔韶. (2016). *银翅: 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 Ashraf, A. M. (2017). Cultural hybridization in the globalized China: A case study of you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4(4), 457-465.
- Benedict, R. (2005). *Patterns of cultur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 Friedman, M. (200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nfield, P. M. (2016). Social change, cultural evolu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8, 84-92.
- Guntuku, S. C., Talhelm, T., Sherman, G., Fan, A., Giorgi, S., Wei, L., & Ungar, L. H. (2024). Historical patterns of rice farming explain modern-day language use in China and Japan more than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Natur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ommunications*, 11, 1724.
- Hamamura, T. (2012). Are cultures becoming individualistic? A cross-temporal comparis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1), 3-24.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 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Ho, D. Y. E. (1985). Cultural values and professional issues in clinical psychology: Implications from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1212-1218.
- Hofstede, G., Hofstede, G.J., & Minkov, M. (2010).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software of the mind*. McGraw-Hill.
- Hu, S. H., & Yuan, Z. G. (2015). 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489.
- Inglehart, R., & Baker, W. E. (2000).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1), 19-51.
- Inkeles, A. (1983). *Exploring individual modern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iu, S. S., Morris, M. W., Talhelm, T., & Yang, Q. (2019). Ingroup vigilance in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6(29), 14538-14546.
-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 Olson, M. (1980).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sons, T. (1971). *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Prentice-Hall.
- Ritchie, L. A., & Gill, D. A. (2007). Social capital theory as an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echnological disaster research. *Sociological Spectrum*, 27(1), 103-129.
- Roberts, S. G. (2015). Commentary: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s. Wheat agricultu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6, 950.
- Ruan, J. Q., Xie, Z., & Zhang, X. B. (2015). Does rice farming shape individualism and innovation? *Food Policy*, 56, 51-58.
- Sampson, E. E. (1988). The debate on individualism: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ir role in personal and societal function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s*, 43(2), 15-22.
- Santos, H. C., Varnum, M. E. W., & Grossmann, I. (2017). Global increases in individualis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9), 1228-1239.
- Smith, A. (2011). *The wealth of nations*. Bottom of the Hill Publishing.
- Talhelm, T., & Dong, X. (2024). People quasi-randomly assigned to farm rice are more collectivistic than people assigned to farm wheat. *Nature Communications*, 15(1), 1782.
- Talhelm, T., & English, A. S. (2020). Historically rice-farming societies have tighter social norms in China and worldwid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7(33), 19816-19824.
-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Shimin, C., Duan, D., Lan, X., & Kitayama, S. (2014).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 *Science*, 344(5), 603-608.
- Van de Vliert, E., Yang, H. D., Wang, Y. L., & Ren, X. P. (2013). Climato-economic imprints on Chinese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44(4), 589-605.
- Wang, X. H., Wang, Y. M., & Liu, N. N. (2023).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narrow the north-south economic gap?—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panel data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40, 117849.
- Whyte, M. K. (1996). The Chinese famil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bstacle or eng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 1-30.
- Yan, Y. X. (2009).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Bloomsbury Academic.

# Time-Space Transition: Contradiction of Rice Theory with Reality and its Epochal Significance

*Li Yinghua<sup>1</sup>, Zhong Nian<sup>2</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aiyuan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2)

(<sup>2</sup>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rice theory advocates that southern China leans towards a collectivist culture. However, when explaining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China, this viewpoint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universal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Furthermore, it does not fit China's situation, in which the south is wealthier and develops faster than the north. Self-construal is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completed based on cultural values.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construal and social expression under collectivist culture can help to summarize the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explore the reason why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ice theory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f explaining the extant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valu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self constructed under Chinese collectivist culture mainly exists in the form of interdependent self, with the core constituent ele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a person and the people around.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has flexible and elastic boundaries between oneself and others, which expressed as facial psychology in daily social intercourse. When in a mixed relation, as people are often more sensitive to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face of both parties in the interaction,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apped in 'relationship fetters',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contracts and healthy oper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der could be affected. In addition, due to its location at the forefro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utherners exhibit more pronounced modern personality traits than northerners, namely a greater tendency towards individualism. Based on thi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the reasons wh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ice theory and reality exists are as follows: its constr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collectivist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and it has not sufficiently explored the huge and rapidly changing factors of self-construal.

Time-space transition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value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led to leapfrog changes in cultural values. Based on the original collectivist culture, the South has quickly integrated more individualistic culture than the North due to its position of the forefro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nifested in that being a collectivist culture as a whole, the south and north of China respectively lean towar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People in southern China have a higher proportion of independent self in their self-construal, and are relatively less concerned with relationship and the resulting gain and losses of face. Contemporaneity and adaptability are main features of "time-space transition" theory. Contemporaneity refer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rrent Chinese social psychology, which reflects people's cultural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daptability means that the change of cultural values has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d is the resul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active choice and adap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space transition, the collectivist culture is a dynamic concept with richer connotations, namely "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 This concept contains both the excellent factors of the original collectivis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ome applicable factors that are organically absorbed from other cultures through social changes (mainly referring to individualistic cultural elements). With deep roots and abundant vitality, the 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 has become a cultural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hich not only breaks the "collectivism dilemma" of "weak economic growth of collectivist cultural countries", but also promotes the adjustment of Chinese new generation's self-construal in the process of adapting to social changes. The element of respecting diversity and showcasing individuality in "independent self" to some extent neutralizes the "relationship" factor of traditional "interdependent self" which could trouble people with Renqing and face. Retaining the core of interdependent self as well as incorporating the advantages of independent self, this "optimized self-construal" is a specific expression of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value i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 and optimized self-construal can be seen as concrete practice and expression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 in the specific fields of cultural motivation and self-construal. With its distinct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time-space transition theory reflects the Chinese wisdom of "open-minded and inclusive" and "adhering to principles and pursuing innovation". It also provides positive inspiration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Key words** rice theory, time-space transition, developing collectivist culture, optimized self-construal,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